

史良与宋庆龄的友谊

今年是我国当代法学家、政治家、女权运动先驱史良诞辰120周年。

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史良与宋庆龄的友谊经历了半个世纪，情真意切，历久弥坚，既饱含了两位杰出女性生死与共的革命情谊，也体现了普通女性之间的姐妹深情，令人回味无穷。

史良结识宋庆龄，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

□ 刘友梅 据《人民政协报》



左起：宋庆龄、史良、蔡畅

营救邓中夏

中国互济会是中国共产党一个重要的外围组织。发起人有杨杏佛、恽代英、杨贤江等各界知名人士，其中以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为主。1933年5月邓中夏(化名施义)被捕后，互济总会也立即展开多方面的营救活动，除派人请唐豪等律师为邓中夏辩护外，还将这一消息报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忠实朋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席宋庆龄，请她设法营救。

史良曾回忆这次会见说：“孙夫人一见我就热情地握住我的手，她那美丽而严峻的面色深深感染着我，给我以信心和勇气。她讲话简短、明确，态度沉着、镇静，眼光坚定、柔和。”当天，她们为营救上海地下党领导人邓中夏商讨了法律援助办法。史良深感责任重大，自己又年轻，于是请了自己的老师、上海著名的律师董康一起承办此案。经过史良等人的大力营救，法院判决邓中夏52天徒刑，同时可以交保释放。

史良认为取得了初步胜利。但她万万没有料到，林素琴却很快叛变了，她交代了施义的真实姓名为邓中夏。国民党不惜花费10多万现大洋，收买了法租界巡捕房的上下，并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强令高三分院作出准许邓中夏“移提”的裁决，同时对作出“不准移提”的庭长记了一个大过。

1933年9月，邓中夏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这是史良“第一次承办为革命者辩护的案件”。此后，宋庆龄经常介绍案件给她，一类是“营救”性质的政治案件，另一类是妇女案件。她们志同道合，共赴国难，营救革命党人于危难，救助妇女姐妹于水火，在长期交往中结下了真挚情谊。

营救“七君子”案件

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在宋庆龄、马相伯、章乃器、沈钧儒的号召和领导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

会(简称“救国会”)在上海成立，会上推举宋庆龄为救国会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由于“救国会”广泛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公开批评国民党“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反动政策，因此，“救国会”自成立伊始，便遭到国民党政府的不断迫害与镇压。1936年11月23日，史良和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七位救国会领袖被当局非法抓捕，酿成震惊中外的“七君子”案。

宋庆龄得知沈钧儒等七人被捕后十分愤慨，立即带领“救国会”展开一系列的营救活动。先嘱孙科带上她的亲笔信星夜兼程，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处，请其敦促放人。12月16日，宋庆龄与马相伯、何香凝三人向全国同胞发表《为七领袖被捕事件宣言》，“要求立刻无条件恢复几位被捕先生的自由。”《宣言》的发表立即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各方人士纷纷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同时展开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给国民党当局造成极大压力。

为救“七君子”出狱，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又发起“救国入狱”运动。1937年7月5日，宋庆龄和胡愈之、彭文应、张定夫、潘大逵等知名人士一起，自带行李，从上海至苏州高等法院，自请入狱。宋庆龄提出探望“七君子”，她首先来到史良被单独关押的房间。她对史良说：“你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我们全国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都在支持你们，你们的斗争一定能够胜利。”史良和宋庆龄热烈拥抱，泪水夺眶而出。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在7月31日将“七君子”释放出狱。“七君子”事件得以胜利解决。

共迎新中国

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曾致电宋庆龄，邀请其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当电报辗转由香港送到宋庆龄手上时，她经过长时间考虑，确认一动不如一静，先后给中共中央回了两个函件，表

示歉意，称“将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诸公见面”。

5月27日，上海解放，新政协筹备会议召开在即，中共派出了党内地位和社会声望都匹配的邓颖超，持毛泽东和周恩来亲笔信南下上海。

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天(5月28日)，史良前往位于上海淮海西路的宋庆龄寓所。宋庆龄在新生的上海与史良重逢，心情十分喜悦，她拉着史良的手说：“解放了，就好了，国民党的失败，是我意料之中的。”

6月25日，在曾长期担任宋庆龄的英文秘书、深得宋庆龄信任的廖梦醒陪同下，邓颖超拜见宋庆龄。但是，邓颖超也没能劝动宋庆龄。当时，宋庆龄正受荨麻疹折磨，这是宋家的家族遗传病，她每遇过度紧张或过度劳累，此病便会剧烈发作。而史良与宋庆龄关系亲近，能够知晓宋庆龄心中的顾虑。史良劝慰宋庆龄，即使因体力不支不能每天到会，也应当参加开幕式。宋庆龄“为之动容”，后来宋庆龄要史良“回沪后与之商决”。史良据此估计“邓亲往劝驾必成”(《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

后来，她和邓颖超一起陪着宋庆龄北上。1949年10月1日，宋庆龄、史良等参加了开国大典。

一生的朋友

“文革”期间，正常的社会秩序被彻底搞乱，宋庆龄和史良也都受到冲击，但是她们之间还是保持着真诚的互相关心和交往。

有一次，史良送给宋庆龄一罐亲手腌制的雪里蕻咸菜。宋庆龄吃完后觉得很好吃，她就亲自打电话给史良说：“这咸菜很好吃，能否再送些给我?(我)再派人来上门取经，了解腌制雪里蕻咸菜的做法好吗?”史良一口答应。过了几天，她就派保姆钟兴宝前往史良家里去讨教腌制咸菜的做法。之后她嘱咐厨师用雪里蕻咸菜烧黄鱼汤，做咸菜肉丝面和咸菜豆瓣汤，以饱口福。

“文革”结束后，史良和宋庆龄又一次欢聚。史良曾著文记载当时的情景说：“宋大姐异常兴奋……她的精神特别振奋，心情十分舒畅，和全国人民一样，她为祖国前途一片光明而欢欣鼓舞。”

1980年圣诞节，宋庆龄邀请史良参加她的家庭晚宴。史良记得，“那天她高兴极了，由于兴奋，显得非常年轻。”第二天，宋庆龄的荨麻疹发作。她托秘书代笔写信给史良，说自己“连楼也不能下，唯有在卧室呆着”。并亲笔签署姓名，又写了“送鸡汁一瓶，请尝尝!”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因病逝世。两天后，史良在《文汇报》发表悼念文章，称宋庆龄为“伟大的爱国领袖，坚强的人民战士”。

1982年5月，史良撰写题为《深切怀念宋大姐》的长文，回忆两人一生的交往和友谊，表示对宋庆龄“永远的祝福”。

首枚金属国徽镌刻金色记忆

60多年前，沈阳第一机器厂的烈火中，熔铸出新中国第一枚金属国徽；如今，这枚直径2米宽、竖直径2.4米高、重达487公斤的国徽，仍悬挂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熠熠生辉。

历史的时针拨转到1950年，制作新中国第一枚金属国徽的任务交给了以铸造和机械加工技术闻名的沈阳第一机器厂(沈阳第一机床厂前身)。“接到任务大家都很激动，铸造车间马上组成了十几人的专门任务小组。”97岁高龄的吴嘉祐回忆。当年，他负责领导钳工组进行国徽制作的第二道工序，在铝合金毛坯上做精加工。

“旧社会工人没地位，当学徒工时的门牙都被打掉了，能为新中国铸造国徽，这是我们工人的无上光荣。”吴嘉祐说。

国徽的材质为铜铝合金。铜铝熔点不同，要获得铜铝合金，使用真空设备不是难事。然而当年我国尚无真空设备，取得铜铝合金必须先将铜熔化成

铜水，再将铝锭放入铜水中慢慢熔化。没有化验设备就用肉眼观察，没有脱氧剂就用木棒搅拌脱氧，没有测试铝水温度的仪器，就在炉子前仔细观察。浇出来的国徽麦粒不鼓，工人焦百顺、陈喜芝等十几人废寝忘食，试制了七八次……“制造国徽在当时难度太大了，那阵子大家吃住都在车间里，夜以继日地工作，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成功铸造了新中国第一枚金属国徽。”吴嘉祐说。

2012年，吴嘉祐圆了自己到北京天安门看看自己亲手铸造的国徽的梦。“那激动的心情我现在都忘不了，当时我吟了一首诗：‘国徽国徽闪金辉，我为国徽制银坯。天安门上撼世界，心中留下幸福美。六十余年分别后，近观国徽展神威。’”吴嘉祐回忆。

国徽铸造熔炼出来的工匠精神、奋斗精神、担当精神，正代代传承，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

也是在2012年，记载新中国工业发展历程的中国工业博物馆在沈阳开馆。在吴嘉祐等老工人

的指导下，博物馆严格按照天安门城楼上那枚金属国徽的尺寸，用老工艺复制了一枚金属国徽在馆里专门展出。时任中国工业博物馆筹建处副主任侯占山说，我们要铭记国徽铸造的奋斗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大幕拉开，在熊熊炉火映照下，一枚巨大的国徽徐徐升起……台下观众掌声雷动。今年6月在沈阳盛京大剧院首演的话剧《国徽》，再次将在场的观众拉回到那个火红的年代。

在金属国徽的诞生地沈阳市铁西区，几十万产业工人正奋战一线，为老工业基地的振兴贡献力量。

全国劳动模范、有着“中国焊接机壳拼装第一人”之称的沈鼓工人杨建华已66岁，仍然穿着蓝色工装出现在车间里。“国徽铸造的荣光虽已成历史，但国徽铸造的精神需要代代传承。我要继续发挥余热，培养新的大国工匠。”

□ 据新华社 张非非 石庆伟 于也童